



梁宗华：汉学与儒学的传承

(2006-1-20 16:27:12)

儒家学说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但儒学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以汉字为载体，自汉代以降，儒学流布遍及东亚四邻国家，形成汉文化圈。就好象蒲公英的种子，儒学超越国家限制，成为整个汉文化圈国家所共享的精神财富。中国儒学的独立系统之外，又产生了日本儒学、韩国儒学、越南儒学等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它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现实中，都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铭刻着儒学传播与影响的印记。

文字是人类思想文化得以准确表达、储存、流传的载体，同人的思维、意识、观念有着本质的联系，而且也在根本上规定着民族思想文化的某种特性。人类从原始的蒙昧状态进到文明人的标志就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汉字以其独特的个性迥异于西方拼音文字，成为汉文化圈共同的文字基础，对东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字作为汉文化最基本的细胞，是汉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如饶宗颐所论，“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1]。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大量的考古发现可证，汉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加上萌芽滥觞期，汉字实际跨越了更为幽深的时间隧道。文字是文化的产物，汉字是一种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在人类文字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世界上曾有一种与汉字同样古老的古文字，如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体等，但它们都很早就消亡了。汉字却历久弥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最发达、完备的表意文字系统。与汉语及汉文化相适应，汉字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与西方文字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及特殊的演进轨迹，形成自己独立特出的个性及恒久不泯的活力，成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及重要传播媒介。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虽然有鼎盛与低谷的起伏，却始终持续不断，汉字实在功不可没。

作为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具有特殊的形体构造——以义构形，以形索义，既具有形象、象形性，又兼具高度抽象的符号功能。

人类文字最初都发源于象形，是一个普遍规律；而在其后文字符号化的过程中，作为形音义统一体的文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成为世界文字中并存的、代表两种发展趋势的文字系统。文字作为文化的产物，体现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古老而生机盎然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典型而唯一的代表。

如果不了解汉字构形特点及规律，很可能会把它与楔形字、圣书体等象形文字混为一谈，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拼音文字在语音层面即在音素单位分节，几十个拼音符号或几百个音节符号，就能从发音层次上准确记录任何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述。汉字虽然没有走拼音化一途，但汉字的性质绝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可以概括的，其形体结构经过系统地、有规律地安排，业已经过了符号化的过程。与拼音文字的字母符号相似，汉字形成基本笔画，演出归类严格、科学的偏旁部首，它们具有与拼音字母基本相同的符号功能，但却不是纯理性的符号。汉字的构字及用字方法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最典型、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因义构形、以象形性为根基。汉字的这种特质适应于汉语，也与中国文化的特质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首先，汉字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汉字是从整体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以“象形”为本原，但这种象形已经脱离了图画的性质，远离了写实。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映着象形表意的影子。汉字从初期的刻划符号，成熟期的甲骨文，金文，再到大篆、小篆，最后经过隶变，发生了质的飞跃，扬弃了最初的那种形象性，形成固定的意符，“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2]。汉字得以脱离写实的象形，首先得益于汉字基本笔画及组合规则。汉字形体结构形式遵循着一定规律，抽象出五种基本笔画，笔画顺序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中间后两边，也形成了基本规则。利用线条构成字体，使汉字进到意象的境界。

[1]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2000年3月，第174页。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关闭窗口\]](#)